

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的“大金砖合作” 与国际秩序转型^[1]

江天骄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传统国际秩序呈现失序、失效、失衡的同时，全球南方正成为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在这一宏大背景下，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金砖热潮。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和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共同构成了“大金砖合作”的时代背景，反映出“大金砖合作”的时代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特征。“大金砖”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是全球南方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推动改革的“先锋队”和凝心聚力的“主心骨”，为全球南方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完善提供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价值引领。总体上，“大金砖合作”对国际秩序转型带来了多个方面的积极效应，但也面临一系列内外部制约因素的挑战。如何确保“大金砖合作”的安全性、实效性和可持续性在未来一段时期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全球南方 金砖国家 大金砖合作 南南合作 全球治理 国际秩序

【作者简介】江天骄，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5) 05-0025-23

[1] 本文系国际关系学院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3262024TZ7）和复旦大学—金光集团思想库 2025 年度课题（JGSXK251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兴起，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不断攀升。部分大国渲染冷战思维，实施“关税战”“贸易战”，打“代理人战争”，搞“小圈子”，严重扭曲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加剧国际社会割裂。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的全方位崛起成为百年变局和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变量。全球南方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超过40%，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世界经济重心不断南移。^[1]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关键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拒绝选边站队，积极劝和促谈，以高度的政治觉醒成为一支塑造国际秩序的战略力量。在各个重大国际场合，全球南方正更加自信地表达自身对未来世界的愿景和期待，逐渐从全球治理的被动参与者向重要推动者转变。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24年实现历史性扩员，迎来新成员国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十个伙伴国^[2]，标志着“大金砖合作”时代的到来。“大金砖合作”为何在此刻崛起？“大金砖合作”又将如何影响国际秩序变迁？本文将尝试从全球南方和北方之间围绕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历史性拉扯与震荡”^[3]角度，阐释“大金砖合作”的时代特征、身份定位及其国际影响，为学界和实务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参见阚静文：《2024，潮起南方》，新华网，2024年12月25日，<https://www.news.cn/20241225/e67a1e6f3a464f31bb54b91a957879f1/c.html>；彭训文、张婧婕：《携手共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南方”》，人民网，2024年7月30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hwb/html/2024-07/30/content_26071896.htm等。

[2] 截至2025年10月，金砖伙伴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古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干达、尼日利亚。

[3] 殷之光：《“全球南方”与新型全球化》，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35—49页。

一、“大金砖合作”的时代特征

西方自由主义秩序危机和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共同构成“大金砖合作”的时代背景,反映出“大金砖合作”的时代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然而,美西方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不愿将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拱手相让,极力矮化、分化和弱化全球南方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完善的努力。“大金砖合作”由此成为应对美西方压制的关键一招,引领全球南方团结自强。

(一) 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

1. 单极霸权相对衰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失序,“霸权特性”难以为继。国际秩序是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1]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又称自由霸权秩序,是国家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以西方国际规则为行为准则解决冲突的状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主要原则包括所谓集体安全、经济开放和民主治理^[2],冷战结束后则发展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支配地位,具有高度等级性和较强的制度化特征。^[3]美国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中心,提供“安全保护”以及市场开放规则和制度等公共产品。美国的联盟体系以及在欧洲和东亚前沿部署的军事力量,使美国在西方世界中扮演了直接和持续的上级角色。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美国自身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成为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核心组成部分。^[4]尤其在冷战刚结束时,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无可匹敌,国际体系进

[1] 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32页。

[2] 王明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基于国际制度视角的分析》,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36—54页。

[3] Daniel Deudney, G. John Ikenberry,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5, No.2, 1999, p.181.

[4]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 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7, No.1, 2009, pp.71—87.

入单极状态。^[1]美国受“历史终结论”的影响，积极对外推广美式自由民主制度和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华盛顿共识”，并在各个领域建立起美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和联盟体系。广大发展中国家要么接受新自由主义，要么沦为“失败国家”。

然而，所谓“民主扩展”战略并未带来预期结果，反而导致大量难民和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地区动荡。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进而演化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漫长衰退期。美国国内民粹主义乘势兴起，痛斥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耗尽了美国人民的财富”。作为过去一百年美国首位敌视自由国际主义的总统，特朗普的二度当选标志着美国作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领袖角色的终结。^[2]尽管西方仍有不少人认为美国霸权并未衰弱，坚称美国在一些关键领域仍具备霸权实力，现行国际秩序仍能维持一段时间^[3]，但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和国际关系学者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等人所指出的，西方霸权的衰落和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是大势所趋，世界转向多极化是美国不得不接受的事实。^[4]

2.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内部失衡，西方意识形态吸引力褪色。以往西方

[1] 参见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1, 1991, p.23;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1999, p.5 等。

[2]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1, 2018, pp.7-8.

[3] 参见 William Kindred Winecoff,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Revisited: Structural Power as a Complex Network Phenomen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6, No.1, 2020, pp.209-252; Mingtang Liu and Kellee S. Tsai, “Structural Power, Hegemony, and State Capitalism: Limits to China’s Global Economic Power,” *Politics & Society*, Vol.49, No.2, 2021, pp.235-267; David A. Lake, Lisa L. Martin, and Thomas Risse, “Challenges to the Liberal Order: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75, Special Issue 2, 2021, pp.225-257 等。

[4] 参见 [美]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版，第 477 页；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1, 2018, pp.7-23 等。

国家对外政策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国内社会及政治的成功。^[1]当前,美西方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特朗普的二度当选到欧洲的“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不断蔓延。^[2]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加剧,党争和政治对立凸显,国家治理能力减退,自由民主制度走向衰败。^[3]2021年1月,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发动“国会山骚乱”;2025年9月,美国极右翼青年领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公开活动中遭刺杀一事,更是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内部裂痕。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进一步削弱了霸权国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掌控力。

事实上,造成民粹主义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加速时期,美国的金融资本和跨国企业国际市场上急速扩张,导致美国国内产业外流加剧、工人失业率高企、贫富差距悬殊以及与移民相关的矛盾激化等问题。^[4]因此,民粹主义者大肆批判过度的开放、自由、市场和平权等价值理念,寻求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掏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精神内核。

3.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制度基础日益动摇,在加剧国际秩序碎片化的同时,也蕴藏着国际秩序重塑的历史契机。一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危机频发,全球性挑战愈发复杂,维护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特朗普第一任内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不断“毁约退群”,并开启所谓“大国竞争”时代;拜登政府上台后为修复美国的外交形象而重回所谓“多边主义”,但实际上是

[1] T.V. 保罗、王年咏、吴宛珂:《全球化、去全球化和再全球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调适策略》,载《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3期,第154—163页。

[2]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1, 2018, p.7.

[3] John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3, No.4, 2019, p.30.

[4] 参见庞金友:《不平等: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经济与社会根源》,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第73—80页;Josh Bivens et al., “Raising America’s Pay: Why It’s Our Central Economic Policy Challeng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June 4, 2014, www.epi.org/publication/raising-americas-pay 等。

大搞“小圈子”和阵营对抗，对中国等“竞争对手”的遏制打压更是变本加厉。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显现出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滥施关税勒索和经济胁迫，其中绝大多数为全球南方国家，甚至包括一些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发达国家”的弱小经济体^[1]，严重破坏正常国际经贸秩序和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导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赖以维系的多边主义基础正逐步瓦解。

二是美国挑动的大国竞争博弈也严重掣肘国际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在经济方面，美国不仅公然违背国际经贸规则，肆意加征关税，而且利用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发起各项制裁，加速全球经济割裂。而在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本就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而近年地区冲突中暴露出人工智能、“星链”、民用无线通信等技术的军事应用不受规则约束的问题，大部分国家关切的安全、伦理和技术和平利用等问题得不到回应，达成集体行动举步维艰。旷日持久的乌克兰危机等由美国幕后策动而引爆的国际冲突更是凸显联合国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面临的尴尬处境。

三是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也反映出国际秩序转型的历史必然性。旧有秩序的失效与失衡，使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更加意识到构建包容、公正与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紧迫性。在此背景下，“大金砖合作”不仅是对自由主义秩序局限性的现实回应，更是推动国际秩序向多极化、公平化与制度性创新方向演进的重要实践。

（二）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

1. 全球南方实力提升，世界格局多极化加速演进。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因素既有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对自身发展的“反噬”，又有南方国家在客观实力上的提升以及主观意愿上对平等的追求。^[2]当前，全球南方的整

[1] 参见《外交部：美方滥施关税无异于剥夺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权利》，新华网，2025年4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50407/6d6c0f7aca604882b9926fd5a887e38f/c.html>。

[2] 宋伟、王越：《世界政治视角下的国际秩序变迁：国际秩序为何趋向平等》，载《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2期，第89页

体实力较冷战时期已有大幅提升,已经成为维护国际和平、带动世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关键力量。^[1]其中,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五分之一,集聚“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2]就国别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稳居世界第二,且综合国力和经济影响力远超绝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印度GDP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的GDP总和已经超过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六个传统发达国家的GDP之和。此外,巴西、俄罗斯、印尼、沙特等新兴经济体也牢牢占据世界GDP排名的前20位。

2. 全球南方要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随着实力的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不愿只作为国际事务中“被动的规范接受者”(Passive Norm Taker),而是要成为“规范塑造者”(Norm Shaper)和“规范创设者”(Norm Maker)。^[3]在全球经济治理议题上,2023年“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通过的《哈瓦那宣言》指出,当前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带来的挑战,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呼吁全面改革国际金融结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4]在安全与发展议题上,美西方国家利用乌克兰危机搞阵营对抗,不断将经贸和科技议题政治化、武器化,不仅不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而且严重干扰国际发展进程。^[5]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在多个重要场合明确表示拒绝选边站队,倡导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在气候变化、

[1]《王毅谈全球南方卓然壮大:风从南方起,潮自南方来》,外交部网站,2025年3月7日, https://www.fmprc.gov.cn/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503/t20250307_11570120.shtml。

[2]《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的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25年9月8日,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9/content_7039633.htm。

[3]参见黄宇韬:《从自主争论到目标争论——新兴国家如何推动国际规范的转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4期,第62—95页;徐进:《理念竞争、秩序构建与权力转移》,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4期,第4—25页等。

[4]《“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通过〈哈瓦那宣言〉》,中国政府网,2023年9月17日,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4536.htm。

[5]António Guterres, “The War in Ukraine: A Silent Assault o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United Nations, April 12, 2022, <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magazine/april-2022/%E2%80%9Cwar-ukraine-silent-assault-developing-world%E2%80%9D>.

公共卫生以及能源、粮食安全等议题上,全球南方自身的规则和制度“集群”基本成形。^[1]全球治理由此前的发达国家(北方)主导逐渐转向南北共治。

3. 全球南方提出新的发展范式,打破西方对现代化的话语垄断。自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就给被殖民国家留下了深刻烙印。关于全球发展的叙事也长期被西方国家主导甚至误导,成为“科学领域中最强烈、最野蛮的思想干预之一”。^[2]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精神支柱,阻碍了国际权力分配与利益格局调整。^[3]非西方国家则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失声状态,在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上被西方国家长期压制。当前,一批非西方大国群体性崛起,在经济上逐渐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成为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特殊现象”。^[4]在实力对比此消彼长之间,“西方书写世界历史的能力、传播启蒙思想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模样改造世界的能力受到了挤压”。^[5]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表明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各国现代化道路不必遵循唯一的西方模式。中国在自身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四大全球倡议,通过新的南南合作模式,给长期困扰南方国家的发展顽疾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案。全球南方国家逐渐走出一条更贴合当地国情民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全球南方的崛起为全球话语体系引入多元文化,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对现代化的垄断性解释。

[1] Amitav Acharya, Antoni Estevadeordal and Louis W. Goodman, “Multipolar or Multiplex? Interaction Capacity, Global Cooperation and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9, No.6, 2023, pp.2339–2365.

[2] [美]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下)》,白凤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62页。

[3] 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22页。

[4] 刘德斌:《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6期,第11—25页。

[5] 陈曙光:《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建》,载《哲学研究》2022年第3期,第5—15页。

（三）霸权国对南方国家的压制

1. 西方国家在近代的殖民掠夺和剥削及当代以西方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秩序是导致南方国家发展脆弱性的重要原因。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迫使南方国家为其提供原材料，只能发展单一畸形经济，并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沦为附庸。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已经充分揭示了南方国家长期遭受到的“中心—边缘”体系的结构性的压迫。^[1]但以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发表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美西方强调南方国家的发展主要面临的是内部改革问题，闭口不谈殖民掠夺以及国际分工不平等对南方的制约。经过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不懈奋斗，直到1974年才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

然而，美西方国家很快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成立七国集团来协调立场，并力图通过长期把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贸总协定（GATT）及其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来把控世界经济命脉。20世纪80年代，美国提高利率引发了南方国家长期的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则利用债务危机要求相关国家推行经济改革，导致这些国家因推行紧缩政策而一蹶不振。美国不仅在上述机构中垄断关键职务，还拥有否决权，固化了机构内部和国际经济利益分配的双重不平等性，甚至明确拒绝支持南南合作项目。^[2]随着美西方提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及苏联的解体，南方国家努力构建新秩序的斗争声音不断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华盛顿共识”，迫使南方国家接受跨国企业并囿于全球产业链底层，全球南方围绕发展权的斗争由此陷入低潮。^[3]

[1] 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 Branislav Gosovic, “The Resurgenc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Kevin Gray and Barry Gills, eds., *Rising Powers an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177-187.

[3] [印度]维杰·普拉沙德：《重振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全球南方的历史宿命与未来选择》，卢屹译，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第58—66页。

2. 南方国家缺乏集体领导和制度性合作平台,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足。尽管全球南方有着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共同目标,但南方国家在发展水平、政治社会结构和历史宗教文化方面差异巨大。这决定了全球南方很难由单一国家领导,而必须由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沟通协调、集体领导。但这样的集体领导机制起初就面临挑战。例如,1955年的万隆会议被认为是南方国家兴起的标志,但第二次亚非会议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以及主办方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等复杂原因未能举行。由于美苏冷战,许多南方国家也被迫卷入其中,未能形成持续有效的集体行动。在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拉美的区域合作虽取得成就,但其散点化和碎片化难以形成合力。^[1]因此,全球南方如何建立一套目标规则明确的协调体系和行动纲领,确立类似于“万隆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奠定集体领导和制度性合作平台是一个重大课题。

反观美西方国家尽管也存在各种矛盾,但以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为纽带,已形成“领头羊加群羊”效应,掌控全球金融、技术、市场、军事和国际组织,共同“管理”资本主义全球化。^[2]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美国作为主导国家凭借自身优势大力推广其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创设并支配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不断扩大成员数量和覆盖范围。当然,美国时常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胁迫他国,以国际制度优势维护其霸权地位。^[3]这也导致历史上南方国家难以形成有效的制度性合作,从而在一波又一波的发展浪潮中错失良机。

3. 全球南方面临西方国家新一轮矮化、分化和弱化的巨大干扰。当前,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世界格局多极化、文明力量多样化的势头几乎达到

[1] 耿协峰、陈灵芝:《“全球南方”概念再认识与发展新路径》,载《当代中国与世界》2024年第3期,第86页。

[2] 参见李小云、徐进:《全球南方能否成为中国新的战略纵深?》,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第38—46页;关于美国与其核心盟友形成的集体帝国主义对全球秩序的掌控,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沈雁南、彭姝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等。

[3] 周桂银:《美国自由国际秩序之辨析——理论、实践与前景》,载《美国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第39—41页。

近代以来的鼎盛阶段。美西方国家则老调重弹、威逼利诱，为矮化、分化和弱化全球南方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努力不遗余力。

矮化即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以庸俗的权力转移或霸权更迭话语来看待全球南方的崛起。例如，美国学者将近代世界历史划分为“西方的崛起”“美国的崛起”“他者的崛起”三个阶段^[1]，将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塑造为“西方中心世界”的对立面，并诬称“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实际上就是要取代美国，获得全球霸权”。^[2]

分化首先是美西方国家的一种话语策略，即通过贴标签的方式“筛选”出美西方国家眼中的南方国家、新兴国家、转型国家，再分而治之。对其中一些发展较快的新兴国家进行拉拢，而对其他国家进行改造。^[3]对于可能抗衡其霸权地位的国家则界定为“修正主义”者，突出其地缘政治威胁。例如，美西方国家不断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试图将中国剥离出南方国家。又如，将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共同归入“全球东方”，将全球南方塑造为东方“威权联盟”和西方“民主联盟”新一轮对抗的中间地带，进而孤立中俄。^[4]

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新兴国家中最具实力的代表，美西方则开展直接的全方位遏制打压，力图弱化中俄的实力和影响力。为了“竞赢”中国，

[1] 参见[美]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赵广成、林民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2] Oliver Stuenkel, *Post-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p.11-12.

[3] John 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in Narcis Serra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 Toward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4-30.

[4] 参见赵明昊：《国家身份、全球南方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载《美国研究》2024年第2期，第37—56页；G. 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0, No.1, 2024, pp.121-138; Aaron L. Friedberg, "A World of Blocs," *The Marshall Papers CSIS Briefs*, April 6,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orld-blocs>; Joseph S. Nye, "What Is the Global South?" *Project Syndicate*, November 1, 2023,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south-is-a-misleading-term-by-joseph-s-nye-2023-11>等。

美国一方面大打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另一方面拼凑各种小多边安全机制和议题联盟，拉拢盟友和部分南方国家在各个领域围堵中国，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甚至还公然用“关税惩罚”逼压南方国家减少同中国的贸易往来。为了彻底压垮俄罗斯，美国利用乌克兰危机大做文章：一是将俄罗斯塑造成“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仅在2022年2月22日后的40天内就对俄罗斯发起5300余项制裁，约是过去40年对伊朗制裁的1.5倍^[1]；二是通过乌克兰打“代理人战争”，甚至冒着引发核战争的风险向乌提供先进远程进攻性武器支持；三是重新激活了“脑死亡”的北约，不仅再度扩员，而且将欧洲牢牢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特朗普再度上台后，不仅强压北约成员国将国防支出提升至GDP的5%，而且要求北约各国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购买美制武器装备，继续向乌提供军事援助。更为恶劣的是，美西方舆论还不断炮制所谓“中俄联盟”“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的虚假叙事，企图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

综上所述，当前自由主义秩序陷入危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赋予了“大金砖合作”的时代性、必然性和重要性。单极霸权的衰落和多元文明力量的回归是历史进步的方向。金砖国家乃至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非西方”的身份，政治底色相同。全球南方崛起为金砖国家推动国际秩序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而“大金砖合作”也是引领全球南方大团结、彰显更强“南方力量”的必然要求。面临美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崛起发起的新一轮拆解和压制，南方国家迫切需要共同抵御外部干涉的战略协同。这一宏大背景凸显“大金砖合作”在全球权力重组中的战略枢纽地位，不仅为全球南方提供制度性承载，也为国际秩序的多极化转型注入持久动力，更为打破“西方制度与价值观一元论”提供可行方案。

[1] 《中国智库发布首份美国对俄制裁评估报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网站，2022年4月4日，<http://rdcy.ruc.edu.cn/zw/hxly/hxlyqqzl/af1d0512205042b4aa06065d2eac8b43.htm>。

二、“大金砖”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角色

金砖合作发起之初就明确了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定位^[1]，聚焦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和发展问题，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金砖国家过去十多年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倡议掷地有声，并在机制建设上通过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取得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有力打破了西方国家的质疑和唱衰。2024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拥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将弱未弱，广大发展中国家将强未强的历史交汇期，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和新型南南合作的典范，“大金砖”勇立潮头，为国际秩序变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大金砖”是全球南方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大金砖”集聚“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增加，具备促进国际秩序转型的物质性力量。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自行推翻现有制度，只会利用制度红利进一步迟滞全球南方的崛起势头，以延缓霸权衰败的到来。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制，全球南方过去长期缺乏足够力量来抵御外部干扰，而“大金砖”的兴起则为全球南方持续发展并推动构建新秩序提供了关键的物质性基础。

从经济规模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大金砖”的GDP超过全球的40%^[2]，超过七国集团。GDP增速方面，2023年印度增速达到9.2%，居世界主要经济体第一，埃塞俄比亚增速为6.6%，印尼、中国、阿联酋、伊朗、俄罗斯等成员国的增速都在3.5%以上，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晤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22年2月21日，http://brics2022.mfa.gov.cn/chn/gjzgj/ljldrhwcgwj/202202/t20220221_10643874.html。

[2]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统计（数据包含金砖十一国），参见<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PPSH@WEO/OEMDC/CHN/RUS/IDN/IND/ZAF/BRA/SAU/IRN/ARE/EGY/ETH>。

均超全球平均水平(2.9%)。^[1] 工业现代化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不仅具备齐全的工业门类,而且在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领域位居世界领先地位。俄罗斯不仅拥有发达的冶金和采矿业,而且在航空航天、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具有优势。印度在高科技人才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医药产品生产位居世界第三。^[2]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商用飞机销量为全球第三。^[3] 此外,中国在东亚、印度在南亚、巴西在南美以及沙特在中东的地区价值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4] 人口方面,“大金砖”人口占全球人口的近一半,且印度、南非、埃塞俄比亚和印尼都拥有年轻的人口结构。^[5] 巨大的人口规模除了带来充分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以外,也意味着“大金砖”拥有更加广泛的政治代表性。

(二)“大金砖”是全球南方推动改革的“先锋队”

“大金砖”以制度性合作协调各方立场,反映全球南方呼声。纵观全球南方的斗争历史,大量的诉求和倡议未能付诸行动,许多合作机制散点化和碎片化,再加上外部打压和干扰,迫切需要能够反映全球南方真实诉求并整合、协调各方利益的平台。“大金砖”有效填补了这一空白,形成了以领导人定期会晤为引领,包括部长级会议、工作组会议、工商论坛、智库论坛、媒体论坛等涵盖各个领域的制度性合作安排。其中,金砖国家领导

[1]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参见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24&name_desc=false&start=2000&view=chart。

[2] 参见“India leads on world AI stage in talent and domain skills: Nasscom chief,” *Business Standard*, September 29, 2024,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industry/news/india-leads-on-world-ai-stage-in-talent-and-domain-skills-nasscom-chief-124092900294_1.html;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India Emerging as a Global Leader in Pharmaceuticals Through Research & Innovation,” November 14, 2023, <https://ciiblog.in/india-emerging-as-a-global-leader-in-pharmaceuticals-through-research-innovation/> 等。

[3] Daniel C é sar Stumm et al.,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brazilian aircraft industry,” ANPEC, https://www.anpec.org.br/sul/2024/submissao/files_I/i7-2bb0547ac2e9ab6ee8cb4ec1431180f9.pdf。

[4] 余南平、栗心蔚:《国际政治经济竞争范式的转变:从全球价值链到战略价值链》,载《欧洲研究》2023年第4期,第79—102页。

[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Summary of Results,” The United Nations, July 2024, <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public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2024-summary-results>。

人峰会是近年来全球南方最大规模的国家元首峰会,被视为“新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标志。^[1]峰会宣言体现了金砖国家间日益深化的共识,包括推进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议程,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完善金砖机制建设等。通过建立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能源研究平台、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和科技创新合作框架等合作机制,金砖国家提高了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集中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关切。此外,金砖国家还通过外长会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等机制,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政策协调,在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问题上积极劝和促谈,坚定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国际秩序民主化、多极化。

“大金砖”以“金砖+”机制作为重大制度创新,不断让发展成果和机遇惠及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创造性地提出“金砖+”模式,举办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共商南南合作和国际发展合作大计。结合“金砖+”模式的成功经验,2022年中国正式提出金砖扩员议题,成员国领导人就此达成共识。“金砖+”机制允许金砖成员国邀请非成员国共同探讨全球治理和区域发展议题,扩大了金砖国家的“朋友圈”。此外,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原本就在战略目标上有诸多相似性,“金砖+”机制加强了两者之间的战略沟通,既让世界更加关注全球南方的利益和观点,也“有助于金砖国家成为团结和协调全球南方的中心”。^[2]在此基础上,扩员后的“大金砖”在全球南方中更具代表性。埃塞俄比亚、埃及、印尼、沙特分别是非盟、阿盟、东盟和海合会总部所在国,为金砖机制带来了更加广泛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而新增的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玻利维亚等伙伴国则进一步增加了“大金砖”与东欧、中亚和拉美地区的联系。“大金砖”在为全球南方带来广阔发展机遇和公共产品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

[1] Rajan Kumar et al., eds, *Locating BRICS in the Global Order: Perspectives from the Global Sou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p.xvii.

[2] 卢静:《金砖合作机制为“全球南方”崛起注入新动能》,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3期,第15页。

全球南方紧密联合，在全球议题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增强。

（三）“大金砖”是全球南方凝心聚力的“主心骨”

十多年来，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代表的金砖精神是金砖国家的金字招牌，得到全球南方的高度认同。以金砖精神引领集体行动、塑造共同价值为“大金砖合作”提供了旺盛的生命力。

金砖精神中的开放包容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世界多样性的充分尊重。“大金砖”对国家间差异性给予高度包容，并鼓励各方通过各层级的对话机制求同存异，扩大合作。二是对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力支持。“大金砖”鼓励各国加强互学互鉴，增进民心相通。通过“金砖国家文明对话”系列活动以及人文交流论坛，多元文明在此共生并进、精彩纷呈。三是拒绝选边站队和阵营对抗。绝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都不愿重回两极体系，因此竞相加入“大金砖合作”。这也反映出“大金砖”的集体身份并不是“反西方”，“而是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基础上寻求与西方更好地共存”。^[1]

金砖精神中的合作共赢突出两个层面的价值导向：一方面以主权平等为前提，实现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1955年被写入万隆会议后就成为全球南方的精神指引，并得到全世界的广泛接受。金砖国家在多个场合强调，主权平等应当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根本遵循。另一方面以务实合作作为根本追求，致力于增进全球南方和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福祉。在2024年10月的喀山峰会上，中国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五大目标。在2025年7月里约峰会上，金砖合作推动全球南方携手共进，促进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治理，让合作成果惠及世界更多国家和人民。在2025年9月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上，中方进一步号召坚持金砖精神，并提出坚持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开放共赢，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坚持团结合作，凝聚共同发展合力“三点建议”。

[1] 牛海彬：《“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载《当代世界》2023年11月，第26页。

三、“大金砖合作”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

“大金砖合作”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代表性，成为国际格局至为重要的新兴力量和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坚实纽带，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协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转型、推动文明对话、提升南方国家规则话语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是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力量。

（一）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壮大国际正义力量，有助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然而，个别国家试图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成为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的诱因。金砖国家多次强调，要公道不要霸道，要公平不要霸凌，走新型安全之路。在具体实践中，“大金砖”通过加强南方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在制度设计中，金砖国家通过领导人峰会、外长会议、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等机制，推动在国际重大安全事务上达成广泛共识。面对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大金砖”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道积极劝和促谈，主张政治解决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为早日恢复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提出建设性方案。在理念传播方面，金砖国家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促进全球安全治理变革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能力建设方面，金砖国家围绕反恐、反腐败、网络安全、防扩散与外太空等建立常态化工作组，加强资金支持、人员培训和信息共享，形成以“大金砖”辐射全球南方的多层次安全合作架构，打造契合各地区和各议题的多边安全机制，共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二）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转型，促进国际发展合作，有助于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由于长期受到传统国际秩序在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话语体系上的双重

压迫，再加上近年来美国挑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和实施单边经济霸凌政策的干扰，许多南方国家距离可持续发展目标越来越远，如何早日实现发展目标是全球南方的核心诉求，也是推动构建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应有之义。中国多次强调，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2025年4月至5月，金砖国家通过外长会晤、经贸联络组会议等机制，多次对美国的“关税讹诈”提出严正关切，坚决捍卫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通过《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金砖国家贸易投资合作框架》《金砖国家加强供应链合作倡议》等一系列经贸合作框架和路线图，将反对保护主义、加强供应链韧性纳入长期战略规划。这种策略不仅增强了各国合作抗压的能力，而且为重构公平贸易秩序提供了新动能。

与此同时，“大金砖”还为缩小南北发展鸿沟、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转型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金砖成员国结合自身国情特点，走出了独立的现代化道路，成为所在地区具有相当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有益借鉴。^[1]另一方面，通过“金砖+”机制创新为广大南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扩员后的“大金砖”以点带面，进一步向全球辐射资金、技术和发展经验，聚焦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全球南方坚定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增添了强大信心。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自2015年开业以来，已累计批准贷款近400亿美元，覆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切实帮助南方国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2]金砖国家还通过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和科技创新合作，推动南方国家间的产业协作和技术转移，突破“低端锁定”，尤其注重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技术领域分享发展红利。

[1] 王友明：《“全球南方”视角下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重构》，载《国际论坛》2024年第2期，第3—32页。

[2] 《罗塞芙：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将迎来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金色十年”》，新华网，2025年4月30日，<http://www.news.cn/world/20250430/00250b27b5fc4cfe83413d71251731c8/c.html>。

（三）推动全球南方文明对话，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有助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1]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核心动力，正深刻重塑国际秩序转型的底层逻辑与实践路径。与传统国际秩序主要反映霸权国的意识形态不同，“大金砖”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鼓励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种理念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打破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合法性来源。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以“和合共生”替代“零和博弈”，以“尊重文明多样性”超越意识形态对立，正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新价值坐标。从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到“金砖国家文明对话”系列活动，“大金砖”已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文交流体系，不仅增进了相互理解与民心相通，也提升了南方国家在全球文明话语传播中的影响力。

（四）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有助于优化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

长期以来，国际规则被主导国家用以维护既得利益，不能反映力量对比的变化，出现了全球治理失效和全球南方失语的困境。特朗普再度上台以来，更加激进地推行“美国优先”，从挥舞“关税大棒”到再度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为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发达国家不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而且将部分国际公共产品政治化、工具化甚至武器化。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聚焦“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个时代课题，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包含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个核心理念，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具体实践中，金砖国家积极推动联合国等机构改革，创设非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机制和平

[1] 张宇燕、徐秀军：《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载《求是》2025年第4期，第50—54页。

台。其中，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金砖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取得的标志性合作成果。^[1]近年来，美国不断利用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特权”，通过调节国内金融政策“洗劫”发展中国家财富，将美元支付系统作为制裁工具，且债务违约风险不断攀升，对全球南方经济安全构成严峻挑战。由此，进一步扩大本币结算、建立“金砖支付”、推动货币体系多元化成为2024年喀山峰会和2025年里约峰会的重要议题。

“大金砖”还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具备在全球能源、矿产等关键领域的结构性权力。尤其在乌克兰危机后，欧亚乃至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和金融链正在重构。俄罗斯明确将能源合作重心向亚洲和南方国家转移并采用本币结算，金砖国家在能源交易中也不断扩大本币结算的比例。此举不仅减少了对石油美元的依赖，而且预示着“一个以能源大宗商品为锚定物基础的新的国际贸易结算方式”^[2]悄然降临，从而推动世界能源金融体系的多元发展。凭借结构性权力，“大金砖”在全球能源、粮食、矿产等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将进一步提升。展望未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网络、太空、深海、极地等新疆域问题仍面临规则空白。“大金砖”正积极开展相关领域务实合作，建立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中国—金砖国家新质生产力研究中心，以普惠共治为原则代表全球南方发声，在规则制定、议程设置和理念传播方面持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增量式改革。

同时也要看到，“大金砖合作”在推动国际秩序转型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仍面临一些掣肘因素。一方面，传统国际秩序并未完全崩溃，其中合理要素仍在持续发挥作用。尽管单极霸权秩序已经衰败，但美西方仍然在军事、金融、科技等领域拥有领先优势。全球南方在这些关键领域的硬实力积累尚需时日，在软规则的参与中虽取得部分成果，但距离实现公正合

[1] 黄仁伟、朱杰进：《全球治理视域下金砖国家机制化建设》，载《当代世界》2022年第7期，第29—33页。

[2] 冯绍雷：《全球转型、俄乌危机与中俄关系》，载《俄罗斯研究》2024年第1期，第27页。

理的目标还有差距。^[1]

另一方面，“大金砖合作”还需克服内外部干扰因素的掣肘。内部挑战主要表现为：一是成员国对合作定位可能存在分歧，沟通协调成本上升。尤其是随着新成员的加入，各成员国对于金砖应当发挥的作用更是有不同的期待。二是如何平衡成员规模与合作效益的问题。部分成员国产业结构相似，同质性和竞争性凸显。一些成员国经济和科技水平相对较弱，可能削弱多边合作收益。三是如何解决平等协商与高效决策之间的矛盾。尽管协商一致原则有其优越性，但随着成员国大幅增加，如何提升决策效率，是否设置常设机构和监督履约机制等问题亟待解决。^[2]

从外部干扰因素来看，一是美西方打压力度进一步增强。例如，特朗普再次上台后不仅对中国、巴西、南非等金砖创始国加征 30% 以上的关税，还多次以“关税惩罚”威胁金砖国家不要挑战美元。^[3] 由于俄罗斯、伊朗等国遭受美西方制裁，“大金砖”合作项目也面临美国滥用次级制裁的风险^[4]，如特朗普以印度继续进口俄罗斯石油为由将原本对印的 25% 关税税率提升至 50%。二是地缘政治动荡导致部分金砖成员国外部环境恶化。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伊以冲突更是直接对俄罗斯、伊朗、埃及等国造成冲击。三是美西方加强对金砖成员的拉拢分化。例如，美国借助“四方安全对话”（QUAD）及相关联盟，对印度等关键国家施加战略压力；与盟友共同发起旨在登月“圈地”的“阿尔忒弥斯计划”（Artemis Program），并拉拢巴西、印度等金砖国

[1] 参见王友明：《“全球南方”视角下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重构》，载《国际论坛》2024 年第 2 期，第 3—32 页；冯绍雷：《危机与秩序：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等。

[2] 马露露、蒋希蘅：《金砖国家气候治理合作：进展、挑战与对策》，载《国际经济合作》2024 年第 5 期，第 7 页。

[3] “Trump threatens 100% tariff on the BRIC bloc of nations if they act to undermine U.S. dollar”，CNBC，November 30，2024，<https://www.cnbc.com/2024/11/30/trump-threatens-100percent-tariff-on-the-bric-bloc-of-nations-if-they-act-to-undermine-us-dollar.html?msocid=117f07cd146f6aa613c715d815256b82>。

[4] 王冬、杨瑞颐：《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反制美欧制裁的效果与启示》，载《俄罗斯研究》2024 年第 4 期，第 148—173 页。

家加入；联合七国集团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倡议（PGII），目标直指“一带一路”和金砖合作，意图通过提供替代融资和标准体系削弱金砖合作的制度性吸引力；阿根廷放弃加入金砖国家，与美国在背后的利诱和施压密不可分^[1]；特朗普再次上台后首次出访就选择包括金砖成员国沙特、阿联酋在内的中东三国，与它们达成超2万亿美元合同，围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芯片、国防和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重点布局，对这些国家进行拉拢渗透，分化其与中国合作关系的企图昭然若揭。^[2]

尽管面临内外部掣肘，但金砖国家在力量结构重组、发展模式创新、文明互动拓展与制度性话语提升等诸多方面的积极效应正持续释放，构成了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向善变革的不可忽视的蓬勃力量，也成为构建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的关键动能。随着其影响力的持续扩大，“大金砖合作”必将在重塑全球发展议程、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进程中书写下更加浓墨重彩的篇章。

结 语

“大金砖”是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危机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背景下的时代产物。“大金砖”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在促进全球南方经济发展和团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方面已经取得诸多成就。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复杂国际环境中，为推动实现国际秩序转型的宏伟目标，“大金砖合作”仍需在以下四个方面稳扎稳打：

一是坚守初心，正确定位“大金砖”与全球南方、西方国家以及内部成员间的三组关系。“大金砖”始终代表全球南方的利益，致力于改进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之处。“大金砖”同时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目的是实现与西方国家平等共治而不是建立反西方阵营。“大金砖”

[1] 参见《阿根廷扔掉金砖“大礼包”，有个国家背后没闲着》，新华网，2024年1月1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40101/32801e4b587c4652a30c9c6c71482f54/c.html>。

[2] 田文林：《“经贸换安全”：美国重塑中东战略？》，载《光明日报》2025年5月17日，第8版。

内部则应继续坚持求同存异，加强战略沟通与协调，淡化领导权竞争。

二是修炼内功，深化“大金砖”与全球南方在经济、金融、科技、产业等关键领域的务实合作。金砖国家普遍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应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发展模式，减少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早日达成，并坚定不移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充分利用新开发银行保障发展资金，扩大本币结算。在网络、太空、深海、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加紧合作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培育新质生产力。

三是完善机制，提升“大金砖合作”的实效性和可持续性。一方面，要推动“大金砖合作”的制度化 and 常态化发展，确保在功能性合作领域设有专项工作组或秘书处协调日常工作。另一方面，要明确“大金砖合作”机制的运行规则，厘清成员国、伙伴国和“金砖+”之间的关系。例如，可以通过制定未来5到10年的发展规划，设立专门的执行监督机制，从而确保相关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的落实；在能源、矿产等特定议题上探索以部分成员牵头，逐步向外拓展的“同心圆”式合作机制。

四是构建话语知识体系，挖掘“大金砖”丰富的文明内涵。全球南方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之外，仍需加快形成一套关于国家现代化和国际秩序转型的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传播体系。“大金砖”涵盖了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文明古国和地区强国，取得了自主现代化的成就，应当在充分吸纳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普遍性规律，提出“大金砖”的全球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和秩序观，为全球南方和人类文明提供公共知识产品和话语力量，激发各个学科的知识创新。

【收稿日期：2025-06-18】

【修回日期：2025-10-15】

（责任编辑：王霄巍）